

国际事务概览

1963年

〔英〕D·C·瓦特 编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D. C. WATT
SURVEY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63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1977

根据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 1977 年版译出

国际事务概览, 1963 年

[英] D. C. 瓦特编著

上海市政协编译工作委员会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5.875 插页 2 字数 366,000

1985 年 9 月第 1 版 198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书号: 3188·56 定价: 3.00 元

内部发行

出版说明

《国际事务概览》是一套规模较大的现代国际关系史丛书，由英国皇家国际事务学会主持编纂，阿诺德·托因比等英美历史学家执笔，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从1924年至1977年，共出书四十六卷，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界限，分战前（1920—1938年）、战时（1939—1946年）和战后（1947—1963年）三编，论述了巴黎和会以后近半个世纪的国际关系。这套丛书的特点是引用大量政府文件、会议记录和档案材料以及许多有代表性的专著，可供我国世界史研究工作者、外事工作者、大专院校师生和其他有关人员参考使用。

这套丛书的战时编十一卷，自1978年起由我社陆续组织翻译出版，并为适应历史研究工作的需要，单独作为一套《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丛书》发行。为加强战后国际关系的研究，现继续翻译出版《国际事务概览》战后编。战后编共十二卷，自1947年至1963年，每年一卷或两年一卷。1963年以后则因国际关系发生深刻变化，英国皇家国际事务学会决定停止编写这套丛书。现有战后编各卷，大体上以时间为经，以地区为纬，论述当时国际上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的重大事件。主要编写人有彼得·卡尔沃科雷西、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和唐纳德·瓦

特等。战后编各卷综述的国际事务比较全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也作了一定程度的分析，但由于作者的资产阶级立场，对有些问题作出了不正确的判断，甚至污蔑马克思主义，敌视和攻击民族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凡此种种，希望读者注意分析批判。在个别地方，翻译时作了删节，特此说明。

如引用本书，务请核对原文，并注明原著版本。

2012/27

前 言

本卷是查塔姆大厦出版的《国际事务概览》丛书的最后一卷。在阿诺德·托因比教授指导下于1924年开始编写的这套丛书，不只是按照《年鉴》的式样和其他有参考价值的同类著作，提供一部由众多专家记述的当时的大事而已，其目的是要提供客观的历史叙述，所写的十分接近事实，不抱民族偏见，以冀后代的历史专业工作者得据以发扬光大。

此外，丛书的每卷都有一个单一的历史观点，因为文稿虽然出自几个作者之手，但最后献给读者的史料，可以说只是通过一个人的双目审定，即通过扉页上所写负责编辑与主要作者的双目。读者因此可以知晓他所处的地位。然而在本文作者看来，由于国家和国际的权力中心业已增多，公认的重大事件也已倍增，要对全世界事务作有效的综合与阐述，就越来越不可能了。事情业已逐渐明显，将来不可能及时全部掌握这种逐年产生的多样化史料，从而有助于读者。学会委员会因此决定，除出版1963年卷外，这套丛书不再继续刊行。每年出版一卷的、与《概览》有关的《国际事务文件》也一并停刊。应该说明，委员会的决定并非反映已出各卷有任何质量上的退化，而是为国际关系的性质发生深刻变化所促使，因而有必要采取另一种与它相适应的分析方法。

查塔姆大厦在编写现代史方面当然仍将继续作出贡献。我们并不建议成立《概览》的任何继承组织以作为学会活动的一个专门和独特的部门。我们的意图是宁愿对国际关系的特殊方面

不时作广泛研究，作为我们总的研究项目中的一部分。虽然研究的中心稍微狭窄些，但包括的时期却比《概览》长。我们相信，这是学会今后为研究国际事务的严谨学者服务的一个更适当的方法。

我们感谢曾为本卷工作的各位人员，其中不仅包括编者和他的合作者，也包括协助研究的科妮莉亚·内瓦里小姐、准备付印文稿的朱迪思·格尼夫人和编制索引的F·N·克罗夫茨先生。说得更广泛一些，学会还要对四十余年来为出版《概览》而撰稿的杰出的学者们深表谢意。《概览》在其早期是一个创新的项目，但它已不断为查塔姆大厦带来了荣誉。此项冒险的事业近年来又得益于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所给予的支持。除了向最近逝世的、为学会所悼念的阿诺德·托因比先生以及在他多年来编辑这套丛书的事业中的忠诚合作者托因比夫人特别致意外，学会还要对彼得·卡尔沃科雷西先生、科拉尔·贝尔教授、杰弗里·巴勒克拉夫教授以及唐纳德·瓦特教授等所完成的工作，表示感谢，因为他们彼此都承担了写作与编辑所有随后出版的各卷《概览》的重任。

安德鲁·肖恩菲尔德

目 录

前言.....	安德鲁·肖恩菲尔德	1
第一编 大国:东西方的冲突和缓和		1
第一章 东西方关系:冷冷的缓和		3
第一节 趋向缓和:最初的阻力, 1963年 1—3 月		4
第二节 趋向缓和:英国的主动, 1963年 4—7 月		16
第三节 莫斯科协议		24
第四节 缓和溜走了, 1963年 8—10月		28
第五节 三个政权的结局:阿登纳、麦克米伦和 肯尼迪		36
第六节 法国否决后的欧洲		39
第二章 中苏冲突		43
第三章 西方各国的金融政策		70
第二编 南亚、东南亚与各大国		103
第四章 西方国家与印度次大陆:中印战争的 后果		105
第一节 印度与西方:态度和政策		105

第二节	印度重整军备：同西方的谈判，1963年	
	1—4月	118
第三节	克什米尔插曲：巴基斯坦的反应，1963	
	年4—5月	123
第四节	印度重整军备，1963年5—11月	130
第五节	印度的对外经济关系	136
第五章	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	
	对抗的序幕	150
第一节	引言	150
第二节	马来西亚的起源，1961年5月—1962年	
	1月	153
第三节	马来西亚的起源，1962年2—12月	167
第四节	外部的挑战与反应	173
	(一) 文莱叛乱	
	(二) 菲律宾与马来西亚：对北婆罗洲的领土要求	
	(三) 印度尼西亚与马来西亚：走向“对抗”	
第五节	国际和区域性外交中的马来西亚	188
	(一) 美国—印尼关系	
	(二) 区域性外交，1963年5—7月	
	(三) 新加坡和马来亚的外交	
	(四) 区域性外交，1963年7—9月	
	(五) 秘书长在北婆罗洲和沙捞越的调查	
	(六) 结论	
第六章	越南	216
第一节	战争的经过	216

第二节	佛教徒危机·····	220
第三节	美国的政策·····	228
第四节	吴庭艳和吴庭儒的垮台·····	235
第五节	北越·····	238
第三编 中东 ·····		243
第七章 阿拉伯联合的结局 ·····		245
第一节	阿拉伯复兴党的失败·····	245
第二节	伊拉克与库尔德问题·····	267
第三节	约旦河水危机·····	275
第八章 也门革命和沙特—埃及冲突 ·····		282
第四编 非洲 ·····		315
第九章 联合国与刚果问题的解决, 1962—		
	1963 年 ·····	317
第一节	引言·····	317
第二节	利奥波德维尔会谈的失败和吴丹计划的 制订·····	321
第三节	吴丹计划实施失败·····	330
第四节	危机结束, 1962年12月—1963年1月·····	339
第十章 谋求非洲的统一 ·····		346
第一节	引言·····	346
第二节	“集团”的解体·····	350
(一) 蒙罗维亚集团: 多哥事件		

(二) 卡萨布兰卡集团

(三) 东非、中非和南部非洲

第三节 非洲首脑会议及其后果..... 372

第四节 非洲统一组织与“解放斗争”..... 380

第五节 非洲统一组织与阿尔及利亚—摩洛哥之

战, 1963年10—11月..... 401

索引 415

第 一 编

大国：东西方的冲突和缓和

第一章

东西方关系：冷冷的缓和

3

如果说 1962 年是对抗的一年，是美苏之间最接近于爆发核战争危险的一年，那么，1963 年却是促使危险的紧张状态明显缓和的一年。缓和之所以是局部的而不是全面的，主要倒并不在于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竞争局面的不可避免，而在于它们都发现，在对付它们自称由各自领导的其他国家方面已陷于困境。苏联必须对付由于共产党中国领导的意识形态方面的挑战而使一个“集团”分裂的问题。美国面对的是三个二等大国：英国、法国和西德。它们在一个单一的欧洲统一体中联合起来是美国政策的主要支持，可是统一体的种种顾虑，不管是集体的或是个别的，经常成为美国行动自由的绊脚石，并常常会把美国的思想引向错误的方向。此外，妨碍两个超级大国的，还有主要是意识形态造成的疑惧以及意识形态或半意识形态的理论，这些都成为正确认识对方立场的阻力。

1963 年看到的只是部分的缓和，这当然使它成为令人失望的和灰心丧气的一年，但毕竟也是有些事情告一段落的一年。在英国，连续三次大选获胜的保守党、十二年来其统治已达顶点的哈罗德·麦克米伦政府，正在丑闻和争夺继任首相的幕后活动中解体。麦克米伦自己在 10 月间因中风而只得下台，由亚历克·道格拉斯-霍姆爵士继任，而选任他的程序却又是那么神秘，以致保守党领导集团中的几个最能干的人物都拒绝在他的政府

中任职。在西德，年迈的总理阿登纳博士发现他本人同他那个被推定的继承人艾哈德博士的意见日益相左。他想迫使他的党另选继承人，但遭到广大党员的强烈反对，所以在他10月间辞职前的最后发言中，对艾哈德博士即将采取的政策还是极度轻视。只有戴高乐总统在这十年中剩下的大部分时间里仍将风平浪静地继续掌权，而这是我们将看到社会民主在英国和西德取得胜利的十年。

- 4 真正的悲剧后来发生在美国。约翰·F·肯尼迪总统是一个有许多缺点的人，他的行政方法留下了余地，使得他的顾问之间在政策方面发生分歧，并具有一种自高自大、自招失败的傲气。然而他又是一个具有超凡魅力的人，他的演讲才华使他成了希望、壮志和信心的化身，这种辩才不管怎样易于使人作拙劣的模仿，然而在行动和创新方面所给予他的能量，在他的前辈中却是绝无仅有的。他在达拉斯悲惨地死在一个精神失常的无名小卒手中，这就葬送了一代人对国际政治的作风和内容会有任何真正实质性改变的希望，对他的国家的自信心也是一个严重的打击。

第一节 趋向缓和：最初的阻力，1963年1—3月

导致美苏达成缓和最高潮的初步行动是在1962年12月采取的，即在白宫和克里姆林宫之间建立起所谓“热线”的优先电传直接联络线，并签署了禁止在陆地、海上、大气层和同温层再进行核武器试验的条约。赫鲁晓夫于12月19日写信给肯尼迪总统，建议“永远停止”一切核武器的试验。他表明，协议已经达成，除地下进行的核试验以外，各国的探测工具已足以控制一切核试验。后来他又对此重申，苏联认为“各国的工具”也同样适

用于探测非法的地下核试验,因此,签署一项协定的障碍是由于美国坚持要在核大国的领土上设置国际控制和国际检查站。他指出,尽管苏联有它自己的看法,却仍旧接受了英国的建议,即应当在苏联领土上设置一些自动地震探测站,并同意在中亚细亚(科加切夫附近)、阿尔泰共和国(波达伊波城附近)和苏联远东地区(雅库茨克城附近)设置三个这样的探测站。在苏联其他两个地震活动较多的高加索和喀尔巴阡山脉地区,由于人口稠密,可以排除在那里进行核试验的可能性。他接着说,苏联甚至准备同意在有地下扰动而不能确定其是否由于地震的地区,每年进行最多三次的现场检查。他声称,美国负责军备控制与裁军事务的代表阿瑟·迪安在1962年10月30日同苏联副外长瓦西里·库兹涅佐夫举行的一次会谈中曾表示,美国对这个数字是可以接受的。在这个基础上,他要求签订一项禁止核试验条约。^①

这封信到达肯尼迪总统的时间选择得非常恰当,因为那时⁵他正好同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在巴哈马群岛的拿骚举行会谈。^②他们两个人都很高兴。麦克米伦在1962年的11月底曾收到赫鲁晓夫的一封信,其中还提议要同英国外长霍姆爵士就柏林问题举行会谈。在给麦克米伦的信中没有提到对现场检查问题所作的任何让步。^③麦克米伦自己,则把可能达成的禁止继续核试验条约,以及他认为必须随之签订的禁止核武器扩散条约,看作是他政治生涯中的最高成就,因为他的政治生涯显然行将告终。肯尼迪总统却认为核大国数目激增,因

① 关于过去对签订一项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的谈判进程,见《概览,1962年》,第18—30页,第34—37页,第42—43页,第74—78页。

② 见《概览,1962年》,第160—168页。

③ 哈罗德·麦克米伦:《在这一天终了时》(Harold Macmillan: At the end of the day),伦敦,1973年版,第484页。

而核冲突难以避免，他为此忧心忡忡。他在1963年3月间说：“萦绕在我心头的是这样一种感觉，除非我们能获得成功，到1970年时，核大国可能是十个而不是四个，而到1975年时，可能是十五个或是二十个。”^①

在柏林问题上，英国首相和美国总统都准备等待事态的发展。如果赫鲁晓夫再妄增加压力，他们有理由相信他们有能力把它顶住。可是，在核武器问题上，他们却成了美国政局的俘虏。当时这里有三种发展或思潮给他们带来相当大的困难。首先是在他们的科学和技术顾问中，对于每年究竟有多少次的地震事件可以十分肯定地不需要作现场检查的意见，显然是大不一致的。为了向美国当局百分之百地保证苏联不违约而需要进行的现场检查次数，以及为阻止苏联进行地下核武器试验而必须进行的现场检查次数，这种争论本身就包含着不小的混乱。正如比较明智的科学家们劝告政府首脑们的，这种混乱使一场争论成为政治性的了。美国著名的有主见的大科学家们，包括康奈尔大学的汉斯·贝蒂博士、马萨诸塞理工学院的布鲁诺·罗西教授和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唐纳德·格拉泽教授等，在1963年4月间都倾向于相信只要三次现场检查已经足够了。英国的观点也是这样。

可是，还有不少科学方面的不同意见在参议院中引起相当大的不安情绪。有那么一帮共和党的坚硬分子，他们总觉得同苏联政府签订协议是可憎的和愚蠢的（他们认为苏联人只要对自己有利，任何协议他们都会破坏，这是不言自明的），更其觉得，从古巴导弹危机过渡到可能的缓和，实在来得太突然，很

^① 小阿瑟·J·施莱辛格：《约翰·F·肯尼迪在白宫的一千天》(Arthur J. Schlesinger Jr.: A thousand days: John F. Kennedy in the White House), 波士顿, 1968年版, 第867页。

难令人接受。从1月中旬开始，他们的情绪愈来愈强烈地表面化起来。他们之中并不缺少具有强硬的反共观点的科学家，例如说服美国政府着手发展氢弹起主要作用的原匈牙利籍物理学家爱德华·特勒，为他们提供了科学方面的支持。又例如，国会原子能联合委员会的一位共和党成员克雷格·霍斯默众议员，在1963年1月25日表示，他认为美国“正在丧失它的核资产”。由于签订任何禁止继续进行核试验的条约，在获得参议院批准之前，必须接受这个联合委员会的质询和审查，所以涉及这种条约谈判的肯尼迪政府和任何外国政府，有充分理由要慎重考虑这一类意见。

因此，肯尼迪总统给赫鲁晓夫的复信^①是小心谨慎的。他只是就赫鲁晓夫谈的几点提出异议，包括所谓迪安说过的美国赞成现场检查不超过三次，英国最初建议的自动地震探测站，把这种探测站排除出堪察加和塔什干的地震活动区以外，并把现场检查限制在地震活动区等等。但是他接着建议美苏之间举行专家级的会谈。赫鲁晓夫1月7日的复信中^②重申了苏联的立场，却接受了这一邀请。会谈按时举行，起先只有美国和苏联的代表参加，后来英国也参加了。这些会谈从1月14日进行到31日，由威廉·福斯特先生代表美国，库兹涅佐夫、费多连科和查拉普金先生代表苏联，并有以英国驻美大使戴维·奥姆斯比-戈尔爵士为首的英国代表团。为了保持主动，肯尼迪总统不顾国会中越来越多的批评（在纳尔逊·洛克菲勒州长于1月29日对众议院共和党议员的讲话中也有反响），于1月26日停止了美国的地下核试验。可是苏联代表于1月31日建议把会谈内容提交

① 1962年12月29日。《国务院公报》(DSB)，1963年2月11日，第200—201页。

② 《国务院公报》，1963年2月11日，第201—202页。